

# 新时代文学呼唤崇高风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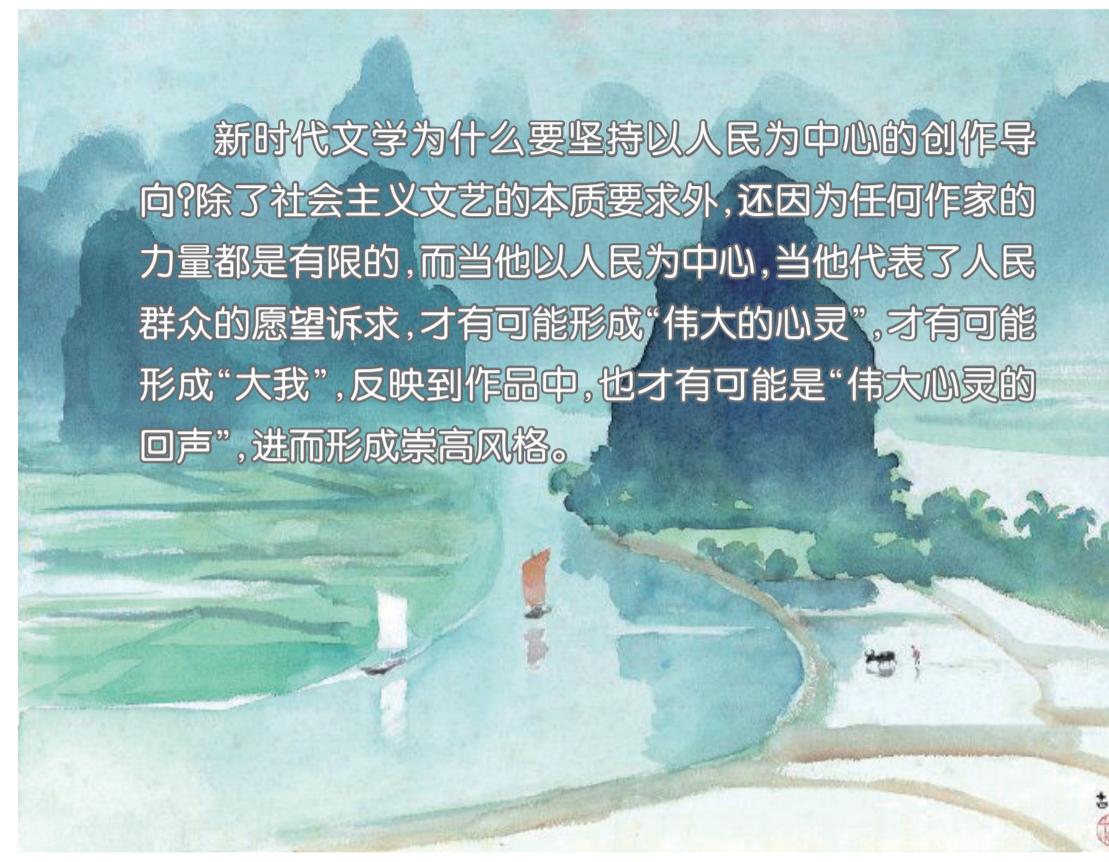
□安 涛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新时代的作家艺术家“应该成为时代风气的先觉者、先行者、先倡者,通过更多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文艺作品,书写和记录人民的伟大实践、时代的进步要求,彰显信仰之美、崇高之美,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鼓舞全国各族人民朝气蓬勃迈向未来”。在这段论述中,习近平总书记对新时代文学做出了全方位的展望和期待,而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对崇高风格的重倡与张扬。

古罗马时期的郎加纳斯,是在西方美学史上最早深度论述崇高风格的文论家,著述《论崇高》体现了其核心美学观点。郎加纳斯认为,崇高首先表现为一种大美或壮美,这种美来自于主客观的融合;就客观层次而论,大自然中的崇高事物,如尼罗河、多瑙河、星光、火山等,都使人感受到大自然的宏大与超迈;就主观层次而论,人生来就有向往崇高事物的天性,加上自然界的崇高事物对人的潜移默化,使人逐渐养成向往崇高的审美理想和热爱崇高的审美情趣,培育出由丰富的思想和激动的感情所形成的伟大心灵。在郎加纳斯看来,外界客观的宏大超迈与内在主观的伟大心灵的结合,构成了“崇高”的基本内涵,用一句话来表示,崇高就是“伟大心灵的回声”。崇高之美就文学而言,是通过文学风格体现出来的,即崇高风格。郎加纳斯指出,崇高风格的语言可从五个方面探析:“庄严伟大的思想”、“强烈而激动的情感”、“运用藻饰的技术”、“高雅的措辞”、“整个结构的堂皇卓越”。郎加纳斯的崇高美学因为阐发了文艺的普遍规律,具有超越时代的意义,对近现代的西方文艺产生过重大影响。朱光潜对郎加纳斯的崇高美学做出过精辟的概括,认为其使“文艺创作方法的重点由贺拉斯的平易清浅的现实主义倾向,转到要求精神气魄宏伟的浪漫主义倾向”。

在中国文学史上,崇高风格有着久远的传承。庄子散文具有开创性的意义,而庄子散文的崇高风格基于其哲学的滋养,“庄子的美学和他的哲学是浑然一体的东西”(李泽厚《中国美学史》)。庄子哲学认为,“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齐物论》),这种强调主体与宇宙相融合的哲学观念,反映了审美实践,就形成了庄子散文注重通过外界客观的自然万物的宏大形象以传达内在主观的理想精神的崇高风格。屈原在诗歌创作中,充分展现了崇高风格的美学魅力,而崇高风格是屈原人格的全面释放,折射出屈原对“美政”理想的执著追求,对国之衰微、民之疾苦的沉痛忧患。司马迁曾言“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屈原列传》),道出了屈原诗歌崇高风格的形成机制,这也回应了郎加纳斯的观点:言辞的伟大来自思想的深邃(《论崇高》)。杜甫诗歌亦具崇高之美,诚如刘熙载在《艺概》中所论,“杜诗高、大、深俱不可及。吐弃到人所不能吐弃,为高;涵容到人所不能涵容,为大;曲折到人所不能曲折,为深。”杜诗中充满了大自然的伟岸形象,那高山峻岭无不峥嵘挺拔而兀立于天地之间,如“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泰山,“入天犹石色,穿水忽云根”的三峡,“惟天有设险,剑门天下壮”的剑门;再看那河流海洋,可谓宏阔流长、波涛连天,如“高江急峡雷霆斗,古木苍藤日月昏”的三峡,“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的长江,“瞿塘峡口曲江头,万里风烟接素秋”的曲江。杜诗的崇高之美,不惟来自于诗人对大自然阔大形象的捕捉与抒写,更来自于诗人对人生理想的追寻和对国运沉沦的忧愤,由此形成了杜诗特有的沉郁雄浑的气象。杜诗无疑诠释了崇高美学的根本特征:崇高是伟大心灵的回声。

崇高风格不仅在庄子、屈原之后的古代作家中代代相传,而且在现当代文学中也焕发出了耀眼的光芒。毛泽东诗词表现出鲜明的崇高风格,并对崇高风格注入了崭新的内涵。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眼光和革命家气度胸襟,使其能举重若轻地把握现实、历史和未来,形成大气磅礴的艺术构思。在毛泽东诗词中,壮景、豪情和哲理得到了深度融合,而无不灌注着革命内容,读来令人心灵为之震撼、精神为之昂扬、意气为之奋发。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国际悲歌歌一曲,狂飙为我从天落”、“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到解放战争时期的“遍地哀鸿满城血,无非一念救苍生”、“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



“三十一年还旧国,落花时节读华章”,再到新中国建设时期的“一唱雄鸡天下白,万方乐奏有于阗”、“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洞庭波涌连天雪,长岛人歌动地诗”、“十年丑史归尘土,一阵惊雷卷飓风”、“先烈回眸应笑慰,擎旗自有后来人”,毛泽东诗词是与现代中国革命史和新中国建设史联系在一起的,诠释着革命者涵古纳今、指点江山、蔑视艰难困苦,领导人民群众创造新世界的万丈豪情。“十七年”时期,当代文学的风格主调为崇高,而塑造层出不穷的英雄人物是这个时期崇高美学的主要表现形态,这种倾向可以从客观情境与主观诉求两个方面来分析。从客观情境来看,近现代的中国革命和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为英雄人物的涌现提供了客观条件,因为无论是现实生活还是历史生活,都满蓄着革命英雄主义的色彩;从主观诉求来说,当人民面对虽然贫穷然而充满希望的新中国时,需要从那些英雄人物身上汲取精神力量,需要崇高风格的文学,只有这样的文学,才能够唤起和释放人民建设的激情。“三红一创、青山保林”的出现,就是这个时期具有崇高风格的代表性作品。这个时期的崇高美学,可视为革命英雄主义的崇高美学,是对崇高美学的拓展与升华。

“十七年”之后,崇高美学在当代文学的演进中承受了三次强烈冲击,经过这样的轮番冲击,崇高美学不仅失去了主导地位,而且似乎越来越变成了“禁区”。“文革”时期,在“三突出”等极端化原则的运作中,英雄人物被塑造成脱离历史理性、现实依据和人性诉求的纯粹为阶级斗争服务的人物,英雄人物的异化实际上也是崇高美学的异化,这是崇高美学在中国文学史上所经受的第一次重大冲击,也是理论者和实践者公然以崇高之名解构崇高美学的行为,自此崇高美学便失去了引领中国文学发展的号召力。进入新时期,人们在对“文革文学”的反思中,将目光对准英雄人物和崇高美学,由对“假大空”的英雄人物的否定延伸到对崇高美学的否定,那时出现的一个引人注目的理论和创作倾向,便是“躲避崇高”。新时期理论者对崇高美学的解构,与世界范围内解构“宏大叙事”的风潮遥相呼应,这是一次漫长而彻底的解构,经过这次冲击,革命英雄主义的崇高美学渐渐丧失了理论的合法性。随着消费语境的产生,仅存的崇高美学的微弱气息也被商品意识形态所荡涤,至此,革命英雄主义的崇高美学几乎完全退出了当代文学史。尽管新时期以来理论者不遗余力地解构崇高美学,但读者对英雄人物和崇高美学的期待似乎并没有减弱,为了迎合读者的需求,理论者开始从“民间”发掘英雄主义元素,于是携带着民间气息的草莽英雄与侠客好汉纷纷出场,即使是革命叙事,主人公身上也不免带有浓厚的江湖气。还应该看到,在商品意识

形态的鼓动下,书写者展开了新一轮“假大空”的英雄人物的塑造,这些人物往往被塑造为具有超自然的力量,能够呼风唤雨、穿越时空、随意变形,这样的所谓英雄已脱离基本的理性。

据上不难看出,新时期以来理论者虽然“成功”解构了革命英雄主义崇高美学,但他们并没有提供一种能够适应时代诉求的震撼人心的崇高美学。理论者从“民间”,从中国传统的侠义、言情、神话等作品中汲取英雄主义元素,并让人物经历古代或现当代事件,将其组构为“新的”崇高美学,这样的美学不可能蕴藏思想的深度与博大,更不可能是作家“伟大心灵的回声”,所以,这样的美学是伪崇高美学。纵观中外文学史,代表一个文学时期高度的文学,往往是彰显崇高美学的文学,这也就理解,为什么新时期以来尽管优秀作品不断涌现,却始终不能形成“高峰”。商品意识形态主导下的文学更与崇高美学无关,郎加纳斯指出,一个作家如果被金钱和享乐的贪求所腐蚀,就等于将整个身心投入了深渊,“人们崇拜自己内心速朽的、不合理的东西,而不去珍惜那不朽的东西,上述的情况就必然发生”,“他们灵魂中一切崇高的东西渐渐褪色,枯萎,以至于不值一顾”(《论崇高》)。当崇高美学丧失,当代文学便失去了聚合力与号召力,各种文学的“丑书”便出笼:抄袭模仿、千篇一律、调侃崇高、扭曲经典、颠覆历史、丑化人民、搜奇猎艳、低级趣味、胡编乱造、牵强附会、炫富摆阔、一己悲欢、杯水风波。可见,当代文学到了不能不扭转的时刻。

正因为这样,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讲话中才大力倡导崇高美学,这是切合当代文学症候的一剂良药,是从改革开放40年当代文学的经验与教训做出的准确判断,也是关系到当代文学何去何从的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就如何在新时代缔造崇高美学,所阐发的一个核心观点就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如其所论,“只有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真正做到了以人民为中心,文艺才能发挥最大正能量”。新时代文学为什么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除了社会主义文艺的本质要求外,还因为任何作家的力量都是有限的,而当他以人民为中心,当他代表了人民群众的愿望诉求,才有可能形成“伟大的心灵”,才有可能形成“大我”,反映到作品中,也才有可能是“伟大心灵的回声”,进而形成崇高风格。只有崇高风格的文学才能深入人心、震撼人心,使读者经受灵魂的洗礼,诚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论:“艺术的最高境界就是让人动心,让人们的心灵经受洗礼,让人们发现自然的美、生活的美、心灵的美。”我们有理由相信,新时代文学在继承中外传统崇高美学、总结革命英雄主义崇高美学的基础上,必将产生出新的崇高美学,迎来一个文学的高峰时期。

20世纪以来,语言学转向对哲学、史学、文学、艺术等研究均有重大影响。对文学研究而言,从语言学角度来探讨相关问题,已经成为重要的理论生长点。南京大学赵奎英教授的新书《语言、空间与艺术》(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10版),就是文学和艺术理论领域探讨语言、空间与艺术关系的一部力作。

该书首先辨析“语言学转向”与当代诗学文化理论建构的关系,继而上溯中国传统,探究语言哲学基础与诗学、文化的生成;然后由古及外,分析语言观念的变革与西方哲学文化的空间化转向;最后从语言与空间、语言与符号来探讨中国古代艺术精神与当代艺术理论研究。整部书结构谨严,从语言学角度,对文学、哲学、艺术等多个学科的基本和重大问题进行了深入系统的探讨,在跨学科、综合性研究的视野下,旧问题得到新阐发,不少论述令人耳目一新。

在“语言学转向”与当代诗学文化理论建构部分,作者抓住语言学转向的两个变革——从自然语言观到符号任意性的转移,从逻辑语言观到审美语言观的变换,指出前者导致诗学与语言学的结合,后者则导致文学理论与文化理论的相互渗透,文艺学研究的“向内转”和“向外拓”就与这两个变革直接相关。从当代上溯语言哲学基础与传统诗学、文化的生成,作者对比了中国的“名”言观和西方的“逻各斯”语言观,认为是它们决定了中西传统诗学的总体格局。概括来说,中国“名”言观具有推重文字、尊崇名分、渴慕道本等特点,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中国古代形成了以“有象的道”为标示的实践论取向的大诗学。

语言总是在不断变化之中,语言观念的变革也会对思维方式、时空观念产生直接影响。西方哲学文化的空间化转向,正是伴随语言观念的诗化、审美化转向而出现,是“反逻各斯中心主义”语言观的结果。西方当代哲学文化的空间化转向,又和中国传统哲学文化有相通之处。中国本身具有的空间方位情结,直接影响到传统艺术的精神与结构,从而具有一种空间化与诗化的特质。但中国学界长时间流行的中国古代“重时间轻空间”、中国艺术的象征是时间的“线性过程”的说法,遮蔽了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空间化精神与结构。该著作通过对古代的语言文字、语言观念、语言结构和宇宙思维模式进行考察指出,中国古代非凡不曾轻视过空间,相反还存在着一种“空间方位情结”,这种“空间方位情结”对中国传统艺术的精神和结构都起到一种深层的模塑作用,使得中国传统艺术,包括叙事艺术、诗歌艺术和绘画艺术都具有一种空间化与诗化的特质。不得不说是对于理解中国传统艺术的结构与精神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最后语言、符号与当代艺术理论研究部分,作者从海德格尔现象学存在论语言观和符号观入手,主要探讨了海德格尔技术与艺术之思、艺术对物的拯救观、海德格尔与夏皮罗之争等问题。作者以海德格尔研究作为全书的收结,这种安排本身也是有意的。正如作者自己所说,这里之所以选择海德格尔,不仅因为他的艺术哲学、艺术理论与他的语言观、符号观是一体相关的,“而且还因为他的现象学存在论语言观、符号观是一种生态语言观、符号观,他的艺术哲学、艺术理论因此也具有一种深刻的生态文化意蕴,有助于我们在生态文明时代从语言哲学、符号学角度建构一种既能切中艺术本身又具有生态人文精神的当代艺术理论。”但建立这种艺术理论,不能只到海德格尔那儿寻求启发,其实,中国道家语言哲学就包含着最彻底的生态精神,海德格尔的语言哲学也是受到道家影响的。因此《语言、空间与艺术》一著还专门探讨了道家语言哲学的生态诗学文化内涵。

整体来看,这部著作具有以下一些鲜明的特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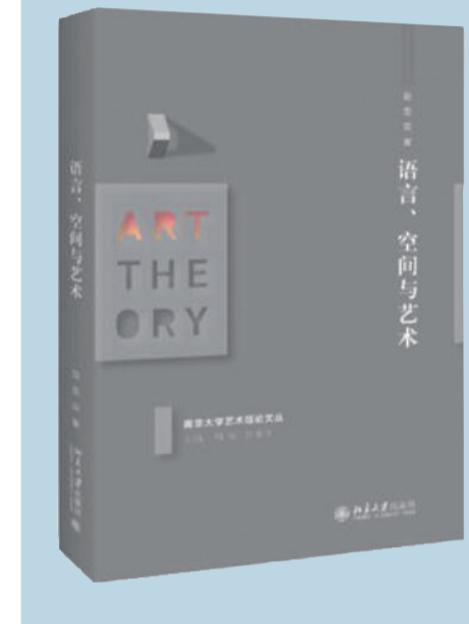
- 一是跨越界限,提出新见。该书属于语言学、语言哲学与诗学、美学的交叉研究,打破了学科的界限,视野更加开阔。在一些受到普遍关注的问题上,广征博引,推陈出新。像指出“意境”就是“道境”,由海德格尔看艺术对物的拯救等,对于该问题的研究和学术发展都有切实的推进。

二是脉络融通,由博返约。该书的五个部分既相互独立,自成一体,又彼此映照,相互勾连,构成有机的整体。就写作来看,研究的问题重大,论述却缜密谨细,有从容之态,复杂的理论问题得以如剥洋葱一般,层层剖开,按照逻辑关系由内而外逐一展现,清晰条理,平实而富有理趣。

这种跨学科的综合研究与写作方式,如果不具备开阔的学术视野,多年积累的深厚学养,强大的逻辑思辨能力,大概是很难做到的。中国改革开放已经40年,学术也在经历了起起伏伏之后进入良性发展的轨道,上个世纪80年代那种各种新思潮新方法在中国跑马圈地的情况已不复存在。立足本国学术传统,兼具国际视野,以开放的胸襟和雍容的气度,兼收并蓄,跨越学科界限,融通古今中西,已经成为学术必然的发展趋势。赵奎英教授的著作《语言、空间与艺术》就很好地体现了这一点。

——评赵奎英《语言、空间与艺术》

□杨帆



(上接第1版)

## “革命夫妻”与“神仙眷侣”

为写作此文,我此次又前往昆明二环西侧府上拜访晓雪,7月19日夜,他刚参加完纪念中国文联、中国作协成立70周年座谈会,自京中归来。岁月悠悠,往事历历,我沉浸于老人巨大而柔韧的气场之中,陪他追忆其人生与中国文坛之点点滴滴。晓雪夫人赵履珠坐于一旁,气质典雅,犹如一朵不老的“金花”。

1957年春节前夕,刚回云南工作不久的晓雪,在大理老家一眼就认出了自己的表妹赵履珠。“七八年不见,你长大成大姑娘了……”仗着表哥的“身份”,晓雪心如鹿撞地拉了一下表妹的手,便匆匆逃了开去。毫无悬念,那瞬间的心跳,就是青年男女之间最美好的起点——一见钟情。他们长达8年的恋爱与整整一生的相濡以沫,由此启航。

爱情是什么?他们经常一起探讨,在晓雪

终于找到自己命定的爱情之前,他也曾苦苦追寻,就在1956年11月,他甚至还听丁玲激情豪迈地大谈过爱情。丁玲在昆明安宁休养期间,到云南省文联探望时任党组书记的老友陆万美。陆介绍晓雪时说他刚写了本文爱青的书,丁玲误听为“爱情”,立即大谈起了爱情的伟大和文学作品中的爱情,还举了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中描写爱情的例子。

在时代的激流之中,晓雪与赵履珠爱得纯粹、执著而坚韧。相恋的8年,他们聚少离多。晓雪因“吹捧艾青”而频频遭遇的各种困境,不断被放大、加重,前途渺茫;而赵履珠则因演唱《五朵金花》主题曲成名,还曾多次被点名加入周恩来总理率领的中国文化艺术代表团,参与外事访问演出,事业一帆风顺。

1961年9月,文化部筹建东方歌舞团,根据周总理亲自提名,从云南调赵履珠和刀美兰进京,赵履珠却一直婉拒。在进入东方歌舞团工作达4年多后,她仍初心不改,终于调回了

云南。“8年,连抗战都赢了哟,我们的8年恋爱也终于圆满。”与我聊着最幸福的这个话题,老人满脸岁月的沧桑倏忽而逝,静坐于对面的夫人刹那绽放笑颜。

窗外细雨如诉,夜色温柔。坐在这对云南文艺界最著名的“神仙眷侣”中间,尽管我是一个采访者的角色,依然觉得太不合时宜。我猛然想起,前两天7月17日,不正是两位老人的结婚纪念日吗?已然整整54年,他们结发就是一辈子,不离,不弃。

## “新中国的阳光雨露”

沙发扶手一边,摆放着那套《我的文学人生》,2018年初刚由作家出版社出版时,我便已认真拜读,深受触动。65万字的篇幅,晓雪细细密密地记述了自己几乎与共和国同龄、也同步的“文学人生”,云南乃至全国文坛的风风雨雨点点滴滴,可谓尽在其中。甚至,许多一直鲜为人知甚至被视为“忌讳”的“历史的细

节”,皆一一记录在“案”。“我是在新中国的阳光雨露滋润下成长起来的。即便是那些最艰辛的岁月、最艰难的事情,我觉得都是人生珍贵的馈赠。”豁达如晓雪,这方面不愿过多言说。

于诗歌与诗评,晓雪之成则不必多说,无可置疑。那些看得见的“硬件”,不妨简单罗列一下:出版诗集、评论集、散文集30多部,获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突出贡献奖、中国当代杰出民族诗人诗歌奖、中国当代诗魂金奖、意大利蒙特罗国际文学特别奖、纽约东西方艺术家协会终身成就奖、湄公河文学奖……在我看来,作为云南文坛以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领军人物之一的晓雪,在文学组织方面所付出的精力与辛劳,远甚于创作本身。除云南省文联党组书记、副主席和省作协主席,他还担任着多届中国作协理事、全委,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诗歌学会副会长、名誉会长,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会会长,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副会长等等。

退休之后,几乎已经卸掉所有职务的这位“普通老人”,却更加闲不下来。为培养、提携新人而写的评论和序跋越来越多,即便是完全陌生的无名作者,但凡作品有一点可取,他都有求必应,加以鼓励;担任各种评委不厌其烦,对所有参差不齐的参赛作品反复阅读,力求披沙拣金,生怕好的苗子在自己手上被遗漏、被耽误。

亲历70年,回望100年,每每思之,岂能不感慨万千?站在百年新诗的历史高度,他对自己心目中成就最大、影响最广泛、最具代表性的诗人,做出了新的阐述。郭沫若、戴望舒、艾青……“是的,还是那句老话,颠扑不破:越是民族的,便一定会越是世界的。”这样一个夜晚,耄耋之年的中国诗人晓雪有些累了,却语气铿锵。在他看来,新中国70年文学发展历程,最大的收获和成就,便在于少数民族作家群体的崛起。

(温星)